

回首新身體的舊時路： 評《亞細亞的新身體》

姚人多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傅大為著，台北：群學，2005年，452頁，ISBN: 9572899082。

台灣歷史上首次的規訓權力長什麼樣子？傳教士馬階為什麼要幫台灣人拔牙？日治時期台灣民間如何看待傳統產婆？為什麼日治時代出生的婦女初潮的時間比清末出生的婦女早了二點六八八八個月？為什麼日治時代台灣婦女卵巢腫瘤比同時期日本婦女來得大與厚？為什麼在日治之前的台灣，男性婦產科醫師似乎是不可想像的怪物？為什麼產婆與助產士這批原本照顧女性生產的人在五十年內快速被男性婦產科醫師給取代？什麼是子宮搔爬術？台灣的婦產科醫師的手術技藝為何揚名國際？為什麼一代婦產科名醫徐千田在回顧他五十年的醫师生涯時卻感到「遺憾」？為什麼台灣有著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剖腹產率？世紀末對男性的身體關照為何集中在性器官？誰在述說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如何被述說？女性主義或基進的人文論述有無可能與醫學或醫療霸權相溝通？為什麼「機器動物人」是切入整個近代台灣性別／醫療／身體史的最佳角度？

以上這些問題我們都可以從傅大為教授的新書《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之後簡稱《亞細亞》）找到清楚的陳述或答案。不管從什麼角度來檢驗，這都是一本內容十分豐富的書。在時間上，《亞細亞》總共跨越清朝、日治、國民黨統治這三個政權，前前後後共一百五十餘年。不管是社會學家或史學家都必須承認，要處理台灣過去這一百多年來紛紛擾擾、錯綜複雜的近代歷史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是，只針對某個特定的議題或事物來進行編年式的整理與探討。不過，傅大為顯然採取了一個較難的方法。《亞細亞》所處理的領域包括了性別、科技、身體、現代性；所包含的人物從清末的傳教士、日治的產婆、掙脫殖民地教育體制的女醫師、終日被生產及勞動綑綁的台灣婦女、戰後的男性婦產科醫師，到今天一天到晚為著男性性愛功能喋喋不休的泌尿科醫師；所來去的空間從傳教士的會堂、痲瘋病院、現代化的手術室，到國際學術研討會；所使用的方法包括對傳統歌謠的文本分析、深入訪談、口述歷史、以及統計量化。傅大為用他廣博的史學知識，配合他獨特的理論關照角度，以及他強烈的人道主義立場，把這段近代歷史處理得既深入又廣泛。

這樣的一本著作在學術上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它細數了目前我們所擁有的這身現代的新身體所走過的衆多道路。作為一個跨領域與跨學科的嘗試，《亞細亞》是成功的。它成功地讓讀者看到，現代性與醫學技術中的性別意涵，以及圍繞在我們身體周邊的那些權力與論述實踐又是如何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結構息息相關。為這樣一本跨領域的精彩著作寫書評是件困難的事。除非評者能在上述所提及的各個領域都跟《亞細亞》的作者下過同樣的功夫，否則任何的評論都將有失公允。有了這個體認，我想先為這篇書評做一個清楚的界定。筆者身為一個對日治台灣歷史有著高度興趣的社會學者，我看事情的角度與關心的問題自然是比較社會學式的。也就是說，我比較關心的是作者的問題是否具有社會學意義、在證據的提出與使用上是否達到社會學的標準，在理論的應用與建構上是否精確地表達出當時台灣社會的特色。至於《亞細亞》這本書中所使用的史料正不正確，所談的史實是不是事實，則留給其他更專業的史學家去談。以下，我分幾個面向來談我對《亞細亞》這本書的看法。

首先是《亞細亞》的理論立場。如傅大為自己宣稱，這本書他所採取的觀點是「後啓蒙、傅柯、女性主義」式的。我對女性主義的論述並不熟悉，所以，我只挑前面兩個來詳加敘述。所謂後啓蒙，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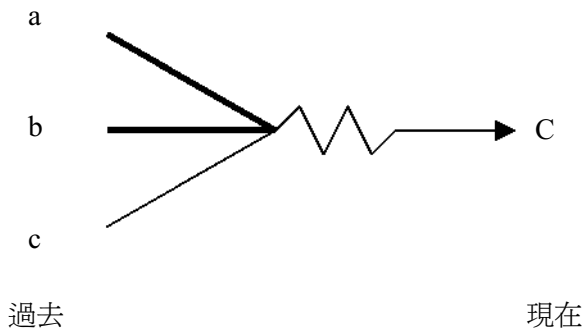
指的是對歷史不斷向前進步這種說法的質疑。換句話說，那些在歷史上所出現的「反動」與「阻力」不是注定要失敗的短暫插曲，歷史不必然總是透過科學與技術向前邁進，而且，後來發生的事不見得比之前的來得進步與美好。在這種觀點之下，作者積極為傳統的產婆所受到的污名化對待提出平反，並且對當前婦產科醫學中強調手術的技藝提出高度的質疑，前者他的做法是從「歌仔冊」中搜尋並捕捉那些已經被科學論述棄之如敝屣的形象，後者他則是追溯如子宮頸癌根除手術的醫學社群歷史脈絡。我個人對這種後啓蒙的史學觀有著高度的肯定，這種史學觀對社會學者來說也許不陌生，但對那些一直活在科技迷思的醫學社群來說，的確有如當頭棒喝。

除了後啓蒙的史學觀之外，《亞細亞》書中最為彰顯的理論關懷則是來自傅柯。當然，整本書中最直接來自傅柯的部分應該是第二章作者對馬階的討論。雖然，我對當時馬階向教眾所施加的權力究竟是不是規訓仍然存有些許的質疑，不過，這只是牽涉到我與作者二人對何謂「規訓」有著不同的看法，不宜在此長篇大論。我想把此處的重點集中在第三章「近代婦產科的興起與產婆的故事」。這一章是我個人認為整本書中寫得最好的一章，原因是在這一章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史學家清楚地描述他個人的歷史觀，以及在當今史學界非常難得一見的豐富的社會學想像力。事實上，這套歷史的看法非常傅柯，不過，傅大為並沒有清楚地點出來。我們姑且把它套上「現在的歷史」這幾個字來加以表述。以下這段話來自傅柯的 *Discipline and Punish*，我認為《亞細亞》一書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處理一個非常類似傅柯的問題：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成為後來的人們普遍採納的行為模式？傅柯提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當時的人們其實有三種不同的懲罰犯人的方式可供選擇，不過，

最終，為何是第三個被人們採用？這強制的、肉體的、隔離的、秘密的懲罰權力模式是如何取代觀念的、戲劇的、指稱的、公眾的、集體的模式？為什麼以監獄為制度性支撐的懲

罰肉體操練（它不是酷刑）取代了懲罰符號的社會遊戲及冗長的傳播節日。(Foucault 1977: 131)

所謂傅柯式的「現在的歷史」要回答的問題不僅僅是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它還告訴人們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更重要的，它必須有一個深切的體認：現在我們所有的其實不必然是這樣子(things are not necessarily like that)，一切的一切都有著其他的可能性。正如同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傅柯解釋了為什麼是監獄在很短的時間內變成歐洲各國家所普遍採納的懲罰模式，傅大為在《亞細亞》一書中也告訴我們，為什麼是男性婦產科醫師取代了傳統產婆與助產士，一枝獨秀地成為女性身體與生產的照料人。如果用圖形來呈現，或許會比較清楚。



圖中的a是傳統產婆，b是現代助產士，而c是男性婦產科醫師。在歷史上，這三批人曾經一起擔任照料台灣婦女生產的相關事宜，不過，從某個時間點開始，a與b這兩批女性迅速從歷史舞台中消失了，c於是變成了大寫的普遍的C。傅大為要問為什麼。這是一個相當棒的問題。不要忘了，男性婦產科醫師在日治之前是一個幾近無法想像的人類，即使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學生仍然極度不願意選擇該科作為日後的專業，原因很簡單：沒有市場。就算是選擇了婦產科作為執業的科別，這些男醫師們的工作大多是在做學術研究

與訓練現代助產士，而不是直接照顧懷孕的婦女。但是，到了1970年代之後，婦產科醫師卻搖身一變成爲台灣醫學界的四大科之一，絕大多數台灣婦女之生產活動都是在醫院這個空間內進行。無疑地，這是一個如作者所言的，「性別／醫療大轉換」。

針對這個大轉換，作者所提出的解釋有四點：早期婦產科醫師開業的「合作策略」、產鉗與婦產科技的性別政治、戰後婦產科墮胎術的流行、一九五〇年代新族群的出現。基本上，對這些理由我是持肯定的態度，也就是說，作者成功地說服我相信大轉換與這些社會與歷史面向有關，不過，我認爲作者在處理這些「原因」的做法上應該可以更好。比如說，在第一點的合作開業策略上。作者事實上只提到了「策略」，但他絲毫沒有提到任何有關這個策略的「效果」(effect)。究竟這個合作開業的策略是一個成功的策略嗎？診所的生意有因此變得比較好嗎？當時台灣婦人的男女授受不親的「心防」有因這個策略而稍被瓦解嗎？她們怎麼看待這種策略？是不是當時所有的婦產科或開業診所都運用了這種合作策略？有用這種策略的跟沒用這種策略的診所在市場競爭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嗎？這些問題我們在《亞細亞》一書中找不到答案。我認爲，講究「策略」是一個值得鼓勵的研究權力的方法，但如果只陳述策略本身，而不去探討策略的效果，很容易犯了「結果論」的謬誤：因爲後來的結果是這樣，所以，過去所有看似跟這個結果有助益的元素都被納入書寫的範圍。

第二有關產鉗與婦產科技的性別政治。作者在書中只告訴我們是哪些人擁有「先進」的技術，答案當然是那些婦產科醫生。不過，作者完全沒有解釋，爲什麼擁有「先進」技術的人便一定會排除那些技術較「落後」者。事實上，我認爲，在這一點上，作者有一絲絲與他的「後啓蒙」觀點自相矛盾的嫌疑。因爲作者似乎預設了，擁有先進技術的男人將是最終的勝利者。當然，我不認爲這是作者的原意。不過，因爲傅大爲在這個關鍵的點上，並沒有告訴我們技術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征服人心，它擁有哪些社會上或文化上的優勢，以及它排除其他傳統技術的確切方案，這些東西的缺席讓他自己陷入一種他自己

最不想見到的「技術決定論」的窠臼之中。

第三關於戰後婦產科墮胎術的流行。這是整本書中最令人驚艷的論證。原來戰後男性婦產科醫師的蓬勃發展不是因為他們成功地接生了許多嬰兒，而是他們成功地「摧毀」或扼殺了許多未來到這個世界上小生命。簡單地說，一個原本應該要「使」人生的權力，卻因為它大量實行了「使」人死的技術而蓬勃發展。這絕對是一個歷史的諷刺。不過，在我看來，作者在這一令人驚艷的論證上所做的處理卻是這個章節中較為粗糙的一部分。如果作者的論點可以成立，那麼作者必須先提出證據證明，戰後的墮胎數目的確比以前的時代來得多，而且，男性婦產科醫師相當程度壟斷了這種手術的執行。然而，綜觀全書，我們找不到作者在這兩點上的強力論證。關於戰後墮胎的比例與數目，《亞細亞》一書給我們的是類似一種眾說紛紜的局面。而且，作者在沒有給我們充分理由的情況下便拒斥其他研究成果，而「選擇」相信他的受訪者：有一個生產便有三個墮胎。我認為，這種談法在社會學上並不够嚴謹。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一定要看到確切的墮胎數目（這也許已經不可考），但我期待作者提出更多證據來證明他的論點，而不是像目前作者所言：「只要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有相當份量的醫師施行墮胎手術，筆者『墮胎有助於醫師競爭』的論點就有了支持」（p.141）。另外，同樣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作者其實可以處理一下國家機器的角色與整個醫療事業市場化與商品化的現象。因為，照作者對口述資料的採信程度，許多受訪者一致認為日治時代的社會控制相當嚴格，換句話說，國家有權力及能力控制了台灣婦女的生產行為。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殖民政權下，台灣婦女是被鼓勵多多生產，而來到了「後」殖民的國民黨政權時代，「生命」本身的重要性或財產性卻反而下降。另外，書中的受訪者一致指出，為婦女執行墮胎手術是婦產科醫師收入的主要來源，那麼這個醫療市場化與商品化的機制到底在《亞細亞》一書扮演什麼的角色，作者其實應該可以多做說明。

第四關於一九五〇年代新族群的出現。作者指出，一九四〇年

末，那些正值生育年齡的外省婦女，由於「與台灣衆多產婆所屬的傳統社區比較隔離，也較少信任感」(p. 149)，加上她們又多享有公眷保的優惠，所以婦產科醫院變成她們的主要選擇。作者承認這一點只是一個假設，目前為止他並沒有具體的資料來加以證實(p.149)。基於此，評論者似乎不宜過度批評。然而，傅大為本人曾在一篇書評中談到，¹ 日治時期的新式產婆沒有取代傳統先生媽並不能從「傳統禮儀與人際網絡仍然強而有力」這個理由來加以論斷。如果傅大為在那篇書評所言為真，那麼未來他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時，似乎應該要解釋一下，人際網絡、族群、與性別／醫療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有沒有什麼通則？為什麼一批人適用，而另外一批人則不適用？

綜合上述，我想提出一個反事實的另類問題，這個問題的目的是在檢驗《亞細亞》一書的性別因素究竟是不是整個台灣近代醫療與現代性中的關鍵因素：如果日治時期的醫學教育也收女性，或者只收女性，那麼傅大為所言的「性別／醫療大轉換」還會不會發生？換句話說，如果從日治時代到戰後國民政權，絕大多數的婦產科醫師都是女性，那麼，傳統產婆與助產士會不會也迅速從婦女生產的舞台上退位呢？如果會，那麼整件事情必須從「非」性別的方式來解釋。也就是說，這一切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也許是起因於整個社會醫療化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醫療商業化、以及各種專業主義理性化的過程，性別在其中其實並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傾向於肯定，也就是說，我傾向認為，不管婦產科醫師的性別是什麼，醫院內的醫師凌駕過傳統產婆與助產士應該是一種結構性的趨勢。這也就是為什麼產婆與助產士是在一種，如作者所觀察的，沒有抗爭、衝突的情況下便消失了。在這一點上，我其實不同意《亞細亞》的作者一個偏向個人主義式的「布娃娃女娃」論點：「對於男性婦科醫師而言，這[手術]也許是種『男性雄風』的呈現，透過知識權力的手術刀，對女性身體作切割與解剖，並且透過這些手術，建構了

1 傅大為(2002)〈書評：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

一個零碎化、身體部分可先後組合切割、容易剖開操作與再縫合的女體」(p.207)。對我來說，這一切也許是一個性別的權力，但它更是一組資本主義商業體系與國家機器積極治理這二者強力結盟的權力。

然後，我們便碰觸到一個根本的問題：到底從清朝末期一路經歷日治時代到戰後的國民黨政權，這些不同的權力究竟是否曾經把「女性」單獨標示出來作為一個權力施行的對象？Frantz Fanon 在他的 "Algeria Unveiled" 一文中，藉著婦人面紗這個有著高度象徵意義傳統之物，來探討一套殖民主義慣用的公式：「贏了女人，其他的便隨之而來」(Let's win over the women and the rest will follow)。他並指出，「在殖民主義的計畫中，是女人被給予撼動阿爾及利亞男人的歷史任務」(Fanon 1965: 15-17)。Fanon 所提的公式告訴我們，女人通常是權力的首要對象。如果 Fanon 所言為真，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在台灣找出台灣婦女類似的「歷史任務」呢？《亞細亞》一書給我的感覺是，在台灣這個「歷史任務」並不存在。若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事情，我們來思考一下傅大為以下的句子：「台灣總督府所構想的『近代文明人』，大概是個男人吧」(p.157)。或者，讓我們來看看傅大為對日治時代遠渡重洋求學的女醫師之詮釋：「這是在日本殖民政權打造文明男人的計畫中，台灣知識女性自主奮鬥的一次精彩表現」(p.23)。當然，每個社會有其不同的結構，即使同樣是殖民權力，也會展現出不同的風貌。同時，一個行動者的表現精不精彩相當程度也是取決於觀察者主觀的判斷。然而，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權力，或者應該說，精緻的治理技藝一直是「放過」女人，² 至少，在國民黨政權大規模的家庭計畫施行以前，未把她們這一群人當成首要的對象。這或許是作者所說的「異質治理」。但如果結核療養所對作者來說是一種「帝國的無力」，那麼，行使在女人身上的治理又何嘗不是「在弱勢與無力的地方，則其治理往往只是聊備一格，並保持沈默、甚至隱藏起

2 這並不表示我否認作者的論點：日治時代台灣中下層婦女的世界是「一個餓、累、苦的世界，是個有作不完的家事、天生就註定是工作機器的世界」(p.92)。

來」(p.188)的「帝國的無力」呢？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亞細亞》一書幾乎有一半的篇幅都是在探討一種「無力的」治理，難道「亞細亞的新身體」便是從這種無力的治理中出現的嗎？

讓我們回到前面所說的「現在的歷史」：事情其實不必然是這樣子。在整本書中，我最感興趣的一個事件是，日治初期在台灣南部的宋牧師娘原本準備好要設立，卻沒有成立的女子醫院。照作者的說法，這間女子醫院已經得到了英國教會本部的首肯，它原本有機會成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間由女醫師主持的女子醫院，不過「因為種種的情況」(p.350)而胎死腹中。我認為，這可以是一個現代歷史上重大的轉折，換句話說，如果這個女子醫院成立了，那麼台灣的現代性非常有可能會循著一條跟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不一樣的「性別化」路徑來展開。台灣總督府的醫學校將很有可能招收女學生，這些畢業的女學生將很有可能選擇婦產科，傳統產婆、現代助產士與婦產科醫師間的競爭或策略結盟將會提早展開。我感到十分好奇，當初是什麼樣的「種種的情況」讓這個提議胎死腹中。作者對這個事件著墨不多，他只有一個註腳裡解釋這個事件，他提到的原因是「一九〇〇年四月，舊樓醫館遷到新樓，而本來準備將舊樓醫館借給宋牧師娘，以成立女醫館，但到五月底，舊樓的租約到期，地主不再續租，故舊樓遂被地主收回」(p.350)。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二十世紀以來整個台灣性別／醫療的歷史或許是取決於一紙偶然的租約。歷史總是一種偶然性、必然性與可能性交織而成的過程與結果，在過去這百餘年台灣性別與醫療的近代史上，我看到了這個交織的過程。這讓我想到了柯志明在《番頭家》的一段喟嘆：不是「讚嘆為政者英明又設想周到的設計，而是感嘆驚訝於事情怎麼會這樣子發展」（柯志明 2001: 372）。某種程度來說，《亞細亞》什麼都有了，就是少了一點對歷史怎麼會這樣子發展的喟嘆！

參考文獻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蕃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傅大為(2002)〈書評：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台灣社會學 247-251。

Fanon, Frantz (1965) *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Allen Lane.